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台灣學業中輟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2-H-029-013-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計畫主持人：劉珠利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1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計畫名稱)

台灣學業中輟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研究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2-H-029-013-

執行期間： 93年 08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劉珠利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台灣學業中輟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研究 中文摘要

在社會工作的領域中，多元文化與性別是兩個重要的角度。西方對學業中輟女性，也同樣採取這兩個角度來檢視，文獻指出：女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文化背景與學校環境互動的結果，是導致女學生學業中輟的可能因素(Blair, 2002; O' Brien, 2003; Weiler, 2000)。在台灣學業中輟的領域中，卻還未曾有研究以這樣的角度來檢視女性學業中輟的問題。從西元 1999 年開始，女性中學生學業中輟的數目，就逐年攀升，一些中輟女生也逐漸的走入性交易、毒品交易等領域，而導致更大的社會問題。有鑑於此，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了解台灣女性學業中輟生的學業中輟歷程，另外一方面也想了解這群女性中輟生的性別角色特質及性別角色特質與學校環境互動的狀況。

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進行，選取受訪者、資料收集、以及資料分析與結果驗證，均遵照紮根理論的方法進行。本研究採用半結構、深入訪談的方式收集資料，總共訪問了 20 位年齡在 13—17 歲之間的國中學業中輟女性。訪談問題的主軸以這群女性自我描述的女性特質、及學業中輟的歷程為主。訪問過程均在獲得受訪者同意之下，全程錄音，訪問結束後並將錄音帶謄寫成逐字稿，作為資料分析的來源。最後再輔以文獻比較及與研究同儕討論的方法，作為驗證研究結果的方法。

本研究的初步結果顯示，造成學業中輟的危險因子包括：對學校課業不感興趣、被學校系統排斥、與學校老師或是同學發生衝突、來自高風險的家庭，包括破碎家庭、貧窮家庭、以及犯罪家庭、或是參與幫派等。本研究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是：本研究的受訪者並不認同“好女孩”的性別角色，反而認同“有一點壞的女性”的性別角色。在台灣文化中，好女孩意指保持甜美、清純、順從與安靜，壞女孩意指有膽識、敢於表現自己的想法與意見。本研究的受訪者認為，壞女孩的形象才符合她們的價值觀、也才能讓她們在她們的環境中生存下去。表現出壞一點以便保護自己，是本研究受訪者處理衝突的策略，而這樣的策略卻違反了學校環境的要求，進而讓她們被學校排斥，而逐漸的走向學業中輟。

本研究另外一個初步的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受訪女性，相當在乎生命中重要的關係，包括：家庭關係、和男朋友的關係等。然而受訪者在這些重要的關係中，都經驗到不同的失落經驗。因此，關係的失落也是造成本研究受訪女性，學業中輟的危險因子。

根據研究的結果，本研究最後對學校社會工作實務，提出建議。

關鍵字：台灣年輕女性；性別角色；學業中輟；質性研究

The Gender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Young Women—The Case of High School Dropouts

Abstract

Purpose: Diversity and gender are important lenses for all fields of social work, including school social work. One area where this has been applied is with high school dropouts, where western literature points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 context and female students' gender identity/ethnic backgrounds a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chool drop out (Blair, 2002; O'Brien, 2003; Weiler, 2000). To date however, a similar analysis has not been conducted with girl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Taiwanese culture for instance, girl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not highly valued. Instead, Taiwanese girls are expected to do poorly in schools in order not to scare boys away. Therefore,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are not viewed as problematic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number of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has been increasing since 1999 and that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include increased involvement of young women in the sex trade and drug trad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dropping out and gender identity of one group of Asian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As a result, it broadens the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risk factors for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Research methods: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was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5 young Taiwanese female high school dropouts, aged 13-17.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focused on their reasons of dropping out and self-described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er shares the same ethnic background with participants, thus,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Mandarin. Interviews were tape-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verbatim. The transcript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fterwards. Open, axial, and selective codings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data. Literature and peer debriefing were used to verify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resul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isk factors include: not interested in school work, experiencing rejections from school systems, having conflicts with teachers and peers, coming from broken families, poor families or criminal families, and being involved in gangs. The most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while the "good girl" image and silence are the cultural norms for females in Taiwan and most Asian cultures,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did not identify with "good girl" image, meaning sweet, innocent, silent, and obedient. Instead, they identify with "different" or "bad girl" image, meaning having guts and voices. They indicated that the "good girl" image leads them nowhere and "different or bad girl" image helps them survive in their own context. Participants adopt voicing their opinions to solve conflicts. This voicing strategy make them experience rejections from school systems, as a result, the very strategies and identities that helped them survive in their own context, paved the way to dropout from schools. Loss of meaningful relationships is also a risk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ir dropout.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Value conflicts are widely discussed in much of the literature on dropout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unique value conflicts and gender identity conflicts which lead females to dropout in Taiwanese culture which are important additions to the cultural awareness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Taiwanese young women; gender identity; dropout; qualitative research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有二，一是期望探討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西元 1987 年後）成長的年輕，學業中輟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並根據結果，提出對中輟女學生的服務對策，二是將這個研究的結果和研究者先前已發展出的，台灣年輕女大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模型，及目前尚在進行中的未受大學教育的年輕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模型作比較。這個研究是由研究者博士論文所延續的研究，期望能逐漸累積研究成果，建立台灣年輕女性的本土性性別角色理論，並希望提供社會工作實務界在服務女性案主時的參考，意即，能將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納入服務方案設計考量中。

研究背景:

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者將分三個部份來說明。第一個部份將說明台灣學業中輟生的現況，第二個部份將說明研究者回顧國內外有關學業中輟生的研究狀況，第三個部份將陳述，就前面兩個部份所導引出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s）。

根據教育部所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的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未經請假，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或是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即列為中輟生。由於學業中輟學生是成為犯罪者的高危險群，依規定學校必須向縣，市政府通報，縣，市政府於收到通報之後，除將行蹤不明學生資料送警政署外，其他學生需指派社工人員進行調查，以期能夠及早發現問題，及早處理。由於法令的正式規定，因此，學業中輟學生成為社會工作人員服務的重要對象。然而在社工員介入中輟生服務工作數年之後，社工人員紛紛提出了不同層面的工作困境，例如：學校拒絕中輟生復學，老師與社工員在專業價值觀上的衝突（郭靜晃，民 90 年），中輟生家庭功能不彰及家長不配合也不重視學校教育（黃木添，王明仁，民 87 年），社工員所提供的服務方式無法讓中輟生接受（蔡依君，民 92 年）。然而近年來也未見到積極克服工作困境的對策出現，研究者在搜尋國內現有已出版的中輟生文獻中，對於中輟生的瞭解，仍然是停留在因個人，家庭等因素所造成的陳述，並未見到具有新意及創見的研究。研究者認為社工員要突破現有的工作困境，需要重新檢視中輟生的情況，從新的角度來研究中輟生，才能突破困境。因此研究者嘗試從台灣中輟生的人口基資料及國外文獻資料，來找尋新的研究方向。

根據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展中心的統計顯示，台灣學業中輟的學生的人數，在 86 學年度為 8984 人，87 學年度為 8368 人，88 學年度為 5638 人，89 學年度為 8666 人，90 學年度為 9464 人，為例年來的高峰，91 學年度則降低為 6859 人，這幾年來學業中輟的人數每年都不盡相同，但是歷年來中輟生大約佔了當年就學總人數的 0.3% 左右的情形，倒是已經維持了將近五年的時間。又再根據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展中心統計資料的交叉分析顯示，中輟生所居住的地區以東部地區居多，國中層級輟學的人數也佔了中輟生總人數的八成五，其中特別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數據是：女性中輟生的比例逐年增加，88 學年度為 40.5%，89 學年度為 45.1%，90 學年度為 46.7%，91 學年度為 45%，女性一直是研究者長期關注的人口群，這種逐漸攀升的中輟女學生的情況，讓研究者不禁想進一

步的瞭解：是什麼原因造成女性學生學業中輟？根據同一份研究統計顯示，學業中輟的原因大致為：個人，家庭，學校，同儕等因素造成的。具體而言，個人因素指的是成就低落，對所有學科均無興趣，意外傷害及重大疾病，智能不足，精神異常，身體殘障等；家庭因素指的是家庭關係不好或不正常，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家庭教育期望低，需在家幫忙家事等；學校因素是指對課業缺乏興趣，師生關係不佳等，同儕因素是指同學關係不好或被不良同學引誘等。根據 90 學年度中輟原因的百分比來看，41%的學生是因為個人因素而中輟學業，25%的學生是因為家庭因素而中輟學業，11%的學生是因為學校因素而中輟學業，10%的學生是因為同儕因素而中輟學業，13%的學生是因為其他因素而中輟學業。因此，中輟學業的因素中佔最大比例的為個人因素，其次為家庭因素。但是資料中並未特別具體指出，造成女性學生學業中輟的主要原因為何。

目前台灣現有已出版的文獻資料，對學業中輟的問題的研究，集中於數個方向：中輟生形成原因的探討（溫怡雯，章勝傑，民 89 年；章勝傑，民 91 年），中輟生形成的原因及處遇方法（黃韻如，民 88 年；黃德祥，向天屏，民 88 年；劉秀汶，民 88 年；鄭崇趁，民 88 年；葉亞寧，民 87 年；陳儀如，民 87 年），中輟生復學後的適應問題（李書文，民 88 年；程秋梅，陳毓文，民 90 年），及資源教室實施成效探討（劉鋸棟，民 89 年）。成因探討方面，研究結果均不脫離個人，家庭，學校，同儕等因素；處遇的方法則大多傾向採取教育及訓導系統的合作，社區資源，中途學校的運用，家庭親職教育的進行等；在實施成效方面，目前僅能以中輟生是否回學校上課來探討成效，基本上，研究結果傾向認為，目前協助中輟生的方法是有效的；中輟生在復學之後，則在自我概念，學習進度，交友方面等，都面臨重新適應的問題。然而研究者所關切的“造成女性學生學業中輟的主要原因為何？”仍舊得不到答案。

國外對於學業中輟的研究，則和台灣有不同的取向。除了學業中輟的原因探討之外（Egyed, McIntosh, & Bull, 1998），也有深入的探討替代教育方案（如 Gener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證書，Building skills for print 方案）對於學業中輟學生幫助的成效（Georges, 2001; King, 2002; Kohler, Snapp, 2000）。還有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角度，是瞭解女性的學校經驗（schooling experience）如何對這群女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及價值觀造成衝擊，這些衝擊甚至於將她們逐漸邊緣化，進而變成學業中輟的過程（Arnot, 1984; Buskirk, 2000; Lloyd & O' regan, 2000; Luttrell, 1997; Mac & Ghail, 1996; O' Brien, 2003）。詳細的內容將於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的部份再作說明。這個角度在台灣目前對學業中輟生的研究領域中，是一個處女地。這個角度部份回答了研究者的問題，然而這個結果是否適用於解釋造成台灣女性學業中輟的現象？台灣學業中輟女性的學校經驗和性別角色特質互動的經驗，和西方人的情況是否一樣？則需要進一步研究。從這個角度（性別角色認同和學校經驗）來瞭解中輟女生，可以突破目前對於中輟生的瞭解，並對中輟生的服務發展出新的方向。這是研究者提出這個研究計劃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研究者以性別角色（gender identity）作為主要的研究興趣，特別是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之後成長的女性，研究者在這方面的研究興趣理由陳述如下：台灣在過去的一百年間，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變遷，總共經歷了三個主要的階段，分別是：日據時

代，戒嚴時期，及解嚴後進入民主時代的時期。西元1987年，當時的總統蔣經國先生，基於人道及世界民主潮流的考量，解除了台灣的戒嚴令，使得台灣正式進入民主時代。這個時代，因為許多從前視為禁忌的議題，全部得以公開的討論。Rubinstein (1999) 就指出，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之後，最大的社會政治特色就是言論表達的自由。楊文宜 (1999) 同時也認為，多元化是這個階段的社會環境特色。多元化同時反應在許多議題上。廖福村 (2000) 指出，台灣解嚴之後，社會環境的多元化，使得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類型，也更加的複雜。Lu (呂秀蓮) (1991) 指出，台灣解除戒嚴的隔年，即西元1988年，一群台灣婦女運動的先驅，在台北進行抗議選美活動在台灣舉行，成為台灣婦女意識覺醒的一個里程碑。Wang (1998) 指出，同性戀的議題在過去是不被允許公開討論的，然而台灣在1990年代之後，同性戀的議題，開始在校園內公開的討論，只是這個議題並未得到很大的注意。江文瑜和邱貴芬 (1997) 分析了一千多首從日據時代至民主時代台灣流行歌曲，發現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以前有關女性的歌曲，談的多數是女性對男性的等待與所受的折磨。而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之後的有關女性歌曲，焦點大多是放在與男性之間的愛與情，並未提到任何的女性意識。在這個社會劇烈變化階段成長的台灣年輕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為何？目前就只有研究者所完成的博士論文討論這個問題。Liu (劉珠利) (2001) 指出，在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之後成長的年輕女大學生，她們的性別角色特質是人際取向的自我 (relational self)，然而，受到台灣的儒家思想及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她們和不同的對象，建立不同特色的關係，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她們相當重視和男朋友之間的平等，互相照顧的關係，也相當注重自己在未來擁有經濟的能力，進而讓自己的生命擁有較多的選擇。由於研究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成長的年輕女性的相關研究很少，因此，這一個主題的研究仍舊需要累積更多的研究。

第三個原因是，研究者近年來企圖建立台灣民主時代成長的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模型。以台灣的文化脈絡下所發展出的台灣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的實證研究，仍然不多。以台灣民主時代成長的女性的性別角色的研究，更是缺乏。有鑑於此，研究者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台灣年輕女大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 (請見所附資料)，目前正在進行中的國科會獎助計劃，是探討未受大學教育 (高中，高職畢業)，且目前正在工作的台灣年輕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 (編號：NSC92-2412-H-029-013)，而學業中輟的台灣年輕女性，在學校經驗或是學習成就方面，和研究者前述兩個研究，是差異很大的一群人口，探討學業中輟女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一方面可以將研究結果和研究者的前述兩個研究結果所形成的性別角色模型 (gender identity model) 作比較，讓研究者的台灣年輕女性性別角色模型更為完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對學業中輟女學生有不同角度的瞭解，進而可以形成服務的對策。綜合上述所言，引發了研究者想探討學業中輟女性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的研究動機。

因此，本研究即計畫以學業中輟的台灣年輕女性，為研究對象。而本研究的研究題目 (research questions)為：

1. 台灣學業中輟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為何？
2. 台灣學業中輟女性學校經驗為何？台灣學業中輟女性學校經驗和性別角色特質間的互動經驗為何？

最後，本研究期望不但能逐漸形成台灣女性性別角色的理論，也希望能根據本研究結果，能對學業中輟女性的社會工作實務，提出建議。

重要名詞解釋：

根據 Katz (1979), Biddle (1979), McNeil and Petersen (1985) 等學者的看法，在本研究中，將性別角色定義為：社會文化及個人所認為，符合女性角色的行為，價值觀，人格特質，能力，興趣，及自我概念。性別角色的特質，是一個由生理因素，還是由社會文化環境所界定而成的？許多的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看法。近期，McIntosh (1999) 所提出的看法，受到較多的注意。McIntosh (1999) 認為，父母根據子女的性別，依照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對於性別的要求，來教育她們的子女，而子女們內化了這些要求而成為她們性別角色的特質。因此，McIntosh (1999) 認為，性別角色特質是跟社會文化環境習習相關的。本研究採取 McIntosh (1999) 的看法，將性別角色特質視為一個由社會文化建構出的變項。因此，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說明，及相關文獻探討，都是著重於性別和社會文化間的關係。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

在文獻探討的部份，研究者將分兩大部份來探討。第一部份為探討西方有關性別角色的理論，包括：佛洛伊德 (Freud)，艾力克森 (Erickson)，柯爾博 (Kolhberg)，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的理論，及 Gilligan 的理論 (有些部份將與研究者去年所提出的國科會研究計劃雷同)；第二部份討論女性性別角色和學校經驗間的關係；第三部份將討論有關台灣女性性別角色的相關研究。

在西方，關於性別角色特質的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大部份的學者們較為熟悉的佛洛伊德 (Freud)，艾力克森 (Erickson)，柯爾博 (Kolhberg) 等人的理論；另外一類為近年來新興的“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理論及 Gilligan 的理論。第一類型的理論，其實是以男性為研究對象，發現男性的性別角色特質是“分離” (separation)，“自主” (autonomy)，及講求“公平正義” (ethic of justice)，然後將以男性為主的研究結果，推論至全體人類，認為上述的特質就是人類(不分種族及性別)的特質。第二類型的理論，強調的就是，男性和女性基本上除了生理結構不同之外，社會文化對男性與女性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因此造成了不一樣的性別角色特質，男性強調自主及分離，而女性強調的是“重視人際關係” (relational self)， “情感交流” (empathy)，及“照顧他人” (ethic of caring)。第二類型的理論，強調的是男性和女性本來就有很多的不同，所以重要的是，人類能夠認同這些差異的存在，並且認同這些差異都是具有價值的。這些理論的主要觀點，將分述如下。因為本研究是以女性為研究對象，因此，對於女性的性別角色理論，有較詳細的討論。

佛洛伊德 (Freud) 的理論：

佛洛伊德 (1927) 從一個身體解剖學的觀點來說明女性的性別角色認同的過程。佛洛伊德認為，人類的發展需經過五個階段的發展，分別是：口慾期，肛慾期，性蕾期，潛伏期，及青春期。在性蕾期的階段，女孩發現自己沒有男性所有的陰莖，女孩非常嫉妒男性擁有陰莖，而且希望擁有陰莖。可是，當女孩發現這是不可能之後，轉而希望能生父親的

小孩。為了吸引父親的注意，所以女孩就轉而學習母親的行為。這就是女孩認同母親，發展自己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的過程。由於女性經歷這種陰莖崇拜的過程，所以女性一生都被愛，恨，被動，自戀，及被虐待的情緒所主導。

艾力克森 (Erickson) 的理論:

艾力克森 (1968) 的理論強調，人類終其一生，有八大發展階段。每一階段有不同的任務需要完成。如果那一階段的任務完成，才能順利的進入下一個發展的階段。艾力克森 (1968) 理論的第四個階段，也就是一個人青春期的階段，就是人類發展性別認同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不分男女都會開始思考自己是誰？這個問題。而女孩為了得到自己的社會地位，所以開始企圖吸引男孩的注意；而且女孩子需要從別人(男性)對她的回饋中，才能發現自己是誰。艾力克森 (1968) 同時指出，女性的空洞的內在，意指女性的子宮，卵巢，陰道，就註定了女性要由男性來填補她空洞的內在，同時也註定了女性一生都很重視和諧與團結，如此才能夠保護，完成女性的生育天職。

柯爾博 (Kolhberg) 的理論:

柯爾博 (1976) 發展了一個三階段的人類道德發展理論，分別是：循規前期 (pre-conventional)，循規期 (conventional)，及循規後期 (post-conventional)。在循規前期的階段，小孩在這個階段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事情只有好或壞兩種；在循規期的階段，小孩非常注意取樂別人，遵守社會規範；在循規後期階段，小孩則著重於正義，法律，及原則。柯爾博 (1976) 強調，不分男女都是依照這個順序來發展道德思考的。然而，如果一個人的特性傾向於與人分離，自主，則較容易達到循規後期的階段。由於女性較依附於其他人，所以女性較少達到循規後期的階段。所以，柯爾博 (1976) 認為，因為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色使然，使得女性的道德發展較遜於男性。

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的理論:

此理論主要說明女性原本就是在強調和人建立關係的環境下成長的，因此，一般理論所強調的自主，分離是成熟的指標，是不適合女孩的。“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理論強調，愛—同理 (love-empathy) 才是女孩的成長模式與目標。

Surrey (1991) 借用 Chodorow，一位精神分析學派的大師的觀點來說，母親一開始對男嬰和女嬰的互動都是相同的，由於社會文化對男性有一定的刻板印象，母親也受這種刻板印象的影響，在跟男孩的互動上，沒有那麼多情感的互動，所以也就造就了男孩在跟人的互動上，比較缺乏情感。母親對待兒子和女兒的態度相當不一樣，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生理上，母親把女兒當成是自己的延伸，對女兒比較有情感上的連結 (connected)，有經驗上的交換，女兒也回應母親的態度，對母親的種種，較有同理的 (empathic)，連結的反應，母親的反應也相對鼓勵，增強了女兒建立對人的同理反應。經由這樣的過程，女兒和母親建立了相互同理的關係，也建立了自我的價值感。Surrey (1991) 認為女孩和母親的關係，使得女孩有較多練習關懷別人的機會，使女孩建立了較易和人連結的性別角色特質。由於女性的特質是一種人際取向的特質 (relational self)，因此，健康的人際關係，才能促成女性全面，健康的成長。而且，女性的自我 (self)，還有認同 (identity)，是從她和人們的互動關係中，從人們的回饋中，逐漸形成的。

由於和人連結的自我(*connected self*)才是女孩的性別角色特質，因此，Jordan (1991) 提出 “互相同理” (*mutual empathy*)，意指想法，感情互相的交流，才是女孩成熟的目標。而擁有彈性的自我界限 (*flexible boundary*)，是達成同理的必要條件。Jordan (1991) 指出，彈性的自我界線才能讓情感自由的交流，才能讓自己覺得被瞭解，才能進一步建立真正的同理。然而在臨床的經驗中，Jordan (1991) 發現，女性在人際關係中，尤其是婚姻關係中，女性習慣於自我犧牲，習慣於單方面不斷的為對方付出，結果造成女性太過於同理自己的伴侶，而太少同理自己，為伴侶付出太多，而太少照顧自己。Jordan (1991) 認為這種不平等的同理 (*imbalance mutuality*) 的同理狀況，是讓女性受折磨，逐漸失去自我價值感，甚至於出現憂鬱症狀的原因。因此，Jordan (1991) 才會強調，除了同理以外，“互相” (*mutuality*)，意指關係中的兩人，平均的貢獻自己，平均的互相關懷對方，也是促進女性發展健康的自我的條件。簡言之，“人際取向的自我” (*relational self*) 是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而擁有彈性的自我界線及相互的同理，是促進女性的關係中的自己健康發展的條件。

許多實證研究結果，顯示女性的自我的確是人際取向的自我，支持了 “關係中的自我” 的理論的觀點 (Goodman, 1990; Lazzari, Ford, & Haughey, 1996; Sperberb & Stabb, 1998)。另外一些研究則提供了更深入的看法。Beeber (1999) 指出，由於女性需要從人際回饋中建立自我，所以，頭一次離開家，到陌生環境中求學的大一女學生，在全無熟悉的支持關係的情況下，她們的自我價值是處在一種非常脆弱的狀態，一遇到壓力事件，自我價值感即變的十分低落，因此極為容易出現憂鬱的症狀。Beeber (1999) 的研究結果明確的指出人際取向的自我，和憂鬱症狀之間的路徑，也同時指出，來自社會支持網絡的回饋，對女性自我價值感的建立和維持，有正向的影響。因此社會支持網絡，對於初次離家的女性，有很大的幫助。

很多女性覺得她們的女性友誼，曾經對她們的問題有很大的幫助，Berzoff (1989) 就針對女性之間的友誼，是如何產生類似的治療效果作為研究主題，以一群有這種體驗的女性為訪問對象，Berzoff (1989) 發現，因為她們的友誼形成了一種支持的環境，她們之間的互相回饋，則產生一種鏡子的效果，讓她們看清楚自己，甚至讓她們重新處理她們過去的母女關係，從而產生了新的認同。Berzoff (1989) 的研究結論，明確的說明了女性可以從滋養的人際關係中，建立健康的認同。

Davenport and Yurich (1991) 的研究結果指出，與人連結 (*connectedness/relatedness*) 同樣是在北美的墨西哥裔婦女與非洲裔婦女的特質，但是，墨西哥裔婦女和男人的關係，是一種非常有力 (*powerful*) 的關係，因為她們的社會化過程讓她們覺得，男人雖然不可靠，然而也是她們一生中，無法放棄的關係。所以她們還是會為男人作一些犧牲的。非洲裔婦女則被社會化成為很強悍的工作者，她們習慣和父母，子女及其他人建立強而有力的關係，然而她們終其一生，並不會和男人建立浪漫 (*romantic*) 的關係。Davenport and Yurich (1991) 的研究點出了一個讓人思考的角度：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她們建立關係的範圍及強度，有什麼樣的不同？這也提供了非白種人，在應用 “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 理論時，可以切入的角度。

總結來說，這些實証研究報告，除了證實人際取向的自我，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年齡階層外，也提出了讓研究者在引用這個理論時，再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女性的人際取向的自我，在不同的情境，還有建立關係的對象不同時，其面貌也有所不同。

一些社工員也將這個理論的概念，運用於臨床工作中。Sesan (1997) 就放棄傳統上，運用行為治療學派的方法來治療患有厭食症的女性案主，而改用和女性案主建立平等，有滋養性的關係，讓女性案主從這種關係中建立對自己的信心，從而修正了厭食的症狀。Manhal-Baugus (1998) 及 Zelvin (1999) 也放棄幫助藥物成癮患者的傳統治療模式，改採用和女性藥物成癮患者建立平等，滋養的關係，幫助女性案主肯定自己，結果發現，這樣的作法，的確幫助了藥物成癮的女性，打破了“關係受挫—藥物濫用”的惡性循環。總言之，實務工作上的報告，也呈現出，針對女性案主的社會工作處遇方法，也必須將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納入處遇方法的設計之中，才能真正達到效果。

Gilligan 的理論：

Gilligan (1977) 提出了一個女性道德發展的理論。她認為，女性的道德發展和女性的特質是有關的，由於女性原本就相當注重人際關係，女性的發展本來就不強調與人分離，所以，女性道德發展的特色是“照顧原則”(ethic of care)，而不是“公平正義原則”(ethic of justice)。Gilligan (1977) 強調，女性的特質是強調“照顧他人”，強調責任，強調自己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之間要求取平衡，女性並不強調只以自己的需要為主。

Gilligan (1977) 的理論認為女性的道德發展，也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為：求取生存 (orientation to individual survival)，處在這個層次的女性，還在為求取自己的生存而努力，視自己是非常缺乏力量 (power) 的人。第二層為：自我犧牲是高尚的”(goodness as self-sacrifice)，處在這個層次的女性，很遵守社會的規範，也努力的達成社會的期望，認為得到別人的認可是很重要的。所以，她們認為自我犧牲是好的。第三層為：“不傷害他人”(morality of nonviolence)，處在這個層次的女性，意識到自我犧牲不一定有用，她們也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意識到自己還是一個有力量(power)的人，意識到自己是擁有選擇權力的人。

除了女性的道德發展理論之外，Gilligan (1992) 同時也對青少年成長過程的性別角色特質變化，提出了一套理論。Gilligan (1992) 認為成長於父權體系之下的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性別角色特質最大的改變，就是從小孩階段的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真誠的待人，逐漸因為環境壓力等因素，而開始隱藏自己的意見，為自己築起保護牆，甚至於轉變為沉默 (silence)。Gilligan (1992) 總結道，許多女性的青少年成長歷程，是一種逐漸沉默的過程。

實務工作者也將 Gilligan 的理論運用於工作中，例如：Baines 等人 (1991) 則以女性一生中的照顧角色為觀點，提出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時，不應該濫用女性的照顧特質，一方面將家庭中的照顧者角色，由女性來扮演，另一方面卻又貶低照顧的價值；Days (2000) 則將女性的照顧特質運用於空間設計上，認為在空間設計上，就應該設計讓女性

執行照顧任務的地方。

Gilligan 的理論得到了許多研究者廣泛的興趣，許多研究者引用她的理論來進行研究。這些研究可分為二類，一類為驗證 Gilligan 的理論，來瞭解女性是否採用“照顧原則”來解決問題。另外一類研究則為試圖找出第三種道德發展的類型。

在驗證 Gilligan 的理論方面，大多數的研究結果都支持了 Gilligan 的理論，也就是女性傾向使用“照顧原則”來解決問題(Dongenberg & Hoffman, 1988; Ford & Lowery, 1986; Lyon, 1983; Mennuti & Creamer, 1991; Rothbart, Hanley, & Albert, 1986)。

在試圖找出第三種道德發展的類型的研究方面，Golden (1989) 分析了電視劇“Murphy Brown”的情節，發現，女主角使用“照顧原則”來解決工作以外的問題，但是採用“自我服侍 (self-serving) — 幽默”的原則來解決工作上的問題，因為照顧的原則對解決工作上的問題，不太有用；Mennuti and Creamer (1991) 以大學校長(男女都有)為研究對象，瞭解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結果發現，這些大學校長並不會只採用一種方法來解決問題，而是採用混合的方式，就是混合了“照顧原則”及“公平正義原則”來解決問題，但是他們的研究還是證實了，女性校長採用“照顧原則”的機會較多；Yeh and Creamer (1995) 以台灣的大學主管為對象，研究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結果發現，他們視問題的性質，而採用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工作上的問題，先是採用“公平正義原則”，然後才是關懷個人的福祉，私人問題上，先是考慮自己的興趣，然後再考慮自己的責任，他們的研究最後還指出，畢竟台灣文化還是傾向於集體文化的色彩，因此，責任對大多數的主管而言，是很重要的考量。

雖然實證研究將 Gilligan 的理論推論的非常複雜，但是基本上，Gilligan 所提出的女性的特質是“照顧原則”的論點，是大家認可的。

綜合以上所討論的西方有關女性角色特質的理論，大致上可以總結出，女性的特質是強調不與人群分離，重視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流，是具備了人際取向的自我，重視自己的需要與他人的需要之間要達成平衡，也就是注重照顧他人。但是，其中較早的理論把這些特質，標籤成負面的，認為是不好的，而近期發展出的理論則認為，這些就是有別於男性的特質，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兩類不同的特質。

有關女性性別角色 (gender identity) 與學校經驗 (schooling experience):

西方文獻中，從多元文化、性別、與社會階層的角度來探討學業中輟問題時，大致的觀點整理如下：

1. 中等學校是複製中產階級性別認同、知識、與價值觀的地方¹，認同取向不同的女學生易被排斥，形成中輟的危險

¹ 性別認同特質，種族文化背景，社會階層背景是非常困難加以絕對區分的，本文所參考的西方文獻也特別提到，這三個因素經常是相互交錯的，因此在本文中也將之視為是相互交錯的因素，無法絕對的區分。

“女性化”通常是性別角色規範中，對女性最常見的要求。然而這並不足以涵蓋性別角色的概念。每一個文化、種族、及社會階層，對於女性性別角色的規範，有其獨特的要求。舉例來說，白種人對於女性的要求是：身材要瘦，行為舉止文雅，當成功男人背後的女性；而黑人對於女性的要求則是：成為一個可以有力的捍衛家人的堅強女性 (Barns, 2003)；中產階級認為成為好妻子及好母親很重要，而勞動階級則認為女性擁有經濟能力很重要 (Stewart and Ostrove, 1993)。Weiler (2000) 指出，在紐約地區的學業中輟女性 (包括勞動階級女性及少數民族) 的性別角色特質是：對於未來缺乏高成就動機，在職業的選擇上以手工業 (manual work) 或全職家庭主婦為主，對於性別角色的期待以傳統女性角色 (母親，妻子) 為主；Lloyd and O’ Regan (2000) 以一群英國學業中輟女性為對象的研究，指出她們的性別角色特質是：對未來的圖像是有一份可以維持生活的工作，及扮演母親的角色。Weiler (2000) 與 Lloyd and O’ Regan (2000) 都共同認為，並不是因為認同 “母親角色” 及 “缺乏高成就動機” 而造成學業中輟，而是當這類型的女學生與學校系統互動並產生衝突，所發生的衝突才是造成學業中輟的主因。下列的文獻對衝突的過程，有較詳細的說明。

在西方 Schooling 領域的重要學者 Arnot (1984) 研究英國的中學教育指出，學校是一個讓學生的家庭社會經濟背景、文化、及性別角色認同三項因素產生互動，相互影響的地方；Arnot (1984) 指出，學校的老師大多數是傾向於認同中產階級 (middle class) 價值觀的人，因此，學校的課程目標絕大多數都是順應中產階級女學生的需要，譬如：課程的內容偏向於教導學生學習秘書工作的技術，成為好妻子及好母親所需具備的技巧等，而且女學生的服裝、髮型、行為舉止的規定，也是以中產階級的女學生的標準為尺度。因此，學校中充斥的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自於勞動階層 (working-class) 的女學生，所帶來的價值觀，例如：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 (可能是勞力工作)，行為舉止不刻意遵守 “仕女” (lady-like) 禮節等，就變的格格不入。因此，在學校環境中，勞動階級的女學生似乎就成了 “偏差” (deviant) 的一羣學生。被歸類為 “偏差” 的學校經驗，對於這一群正處於發展性別角色認同的中學女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Arnot (1984) 並未具體的說明影響的結果，然而 Arnot (1984) 建議，學校應該和家庭、工作等，有更多的對話，讓學校成為一個更好的性別角色社會化的機構。O’ Brien (2003) 以愛爾蘭的中學生為對象，研究她們的學校經驗與性別角色特質間的關係。結果顯示，這一群女學生在經歷兩年的中學教育後，形成兩組不同類別的學生，一組是接受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的學生，這一組的學生就成為好學生，對於課業很認真，學業成就高，接受學校的衣著規範，願意用較多的課後時間來完成課後作業 (homework)；另外一組則是不接受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的學生，這一組的學生就成為學校中被孤立，被邊緣化的一群學生，對於課業態度鬆散，對於學校的衣著規範有很情緒化的反應，甚至反抗，不願意用較多的課後時間來完成作業。O’ Brien (2003) 認為許多正式與非正式的因素造成女中學生中輟學業，對於勞動階層的女中學生而言，以中產階級價值觀為主流的中學，有太多對她們不利的因素，讓她們逐漸遠學校。因此，學校體系與女學生性別角色之間的互動，是一個中輟原因探討中，值得注意的因素。

除了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的差異之外，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制，也是另外一個促使女

學生中輟的因素。Blair (2002) 認為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基本上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父權體系，多數的高階主管為男性，課程以及校規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設計，忽略女性的特質與需要。男性和女性的發展與需要，本來就不一樣，例如：男性重視獨立自主，而女性重視關係的建立 (Jordan, 1997)。當女性顯現出不同於男性的需要與做法時，在這樣的系統中，就運用了一些方法來壓迫與它不同的意見與作法，對學校社工、女老師、及女學生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最常見的壓迫方法就是以議題控制 (topic control)、干擾 (interruption)、控制解釋事情的方向 (interpretive control)、及忽視 (nonresponse) 來迫使不同意見者保持沉默。這樣的作法讓女性學生學習到，如果想要在學校成功，那麼就是保持沉默，保持不被注意，遵守所有規範，就能夠順利成功完成學業；想要挑戰或是反抗，就會被刁難，最後造成離開學校。Blair (2002) 建議，如何和“父權”的文化與價值觀溝通，是學校社工員的工作之一，也是學校社工員幫助學生的任務之一。Blair (2002) 將學校視為一個父權體制複製的產物，的確是一個過去大家不曾採用的角度，值得深思。

類似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 Taylor, Gilligan and Sullivan (1995/1997) 的研究中。在哈佛大學的支助之下，她們以美國東岸女子中學的學生為對象，進行一項长期的女性性別角色發展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這些女學生剛從國小畢業進入中學時，是一派天真，有話直說，無所畏懼；然而在中學幾年之後，這些女性逐漸的變為沉默，和學校同學或是老師互動時，變的不敢暢所欲言，因為她們發現暢所欲言並不一定能夠帶來好處，沉默變成是她們適應成長，適應環境要求的方法。有趣的是，有中輟危險的女學生，特質是擺盪在沉默與勇敢表達自己之間，因為她們想要表達自己，結果讓自己失掉所有的關係、被批評為離經判道 (off keys)，進而逐漸走向中輟。Taylor, Gilligan and Sullivan (1995/1997) 的研究以及上述 Blair (2002)、Arnot (1984) 的研究提醒大家，不願意接受學校單一方向的要求，並且“有膽”講出自己想法的女學生，本身就已經帶有學業中輟的“危險因子”，如果學校系統並未準備接受不同的語音，那麼這些女學生中輟也就不足為奇。

種族與社會階層交錯形成的價值觀，也可能是形成中輟的因素之一。Luttrell (1997) 以美國費城及北卡二地的學業中輟、勞動階級黑人女性為對象，瞭解她們的學校經驗的關係。結果發現，這群女學生認為學校的經驗和她們的性別角色認同之間是有衝突的，因為學校經驗對於她們完成女性的任務，是沒有幫助的。她們在黑人勞動階層社區中生存，並不需要學校所教授的知識，反而是母親的經驗與智慧才能幫助她們成為稱職的女性。而要成為老師喜愛的學生，就必須學習成為老師的“寵物”（接受老師的觀念）。當她們不願意成為老師的“寵物”，這種對於學校知識的態度，和白種女學生相較之下，就得不到老師的喜愛，成為邊緣的一群學生，進而成為學業中輟。因此，不論是學校的使命、師生的關係、權威關係等，都應該要重新思考，它們是否只代表某一階級與種族的價值觀？過於狹窄的價值觀，將會使其他代表非主流價值觀的學生被排除於外。

簡言之，上述的研究均顯示，西方世界的中等學校是複製白種人、中產階級、父權社會性別認同、知識、與價值觀的地方，認同取向不同的學生易被排斥，當學生感受到排斥時，就埋下了中輟的危險因素；中學女學生學習和自己的性別角色及文化、社會背景配合的課程，興趣較高，當學習的興趣提高時，學業中輟的危險性就為之降低。上述的文獻，

讓研究者反省到台灣的中等學校，充斥的是什麼樣的概念？是否存在西方社會中同樣的現象呢？長期以來，中華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台灣中等學校的主流思想與價值觀。近年來，因為台灣強調本土意識，強調向自己的次文化學習，所以在課程中已經加入了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等教材。然而在女性性別角色的議題上，除了近年來積極的倡導的兩性平等的教育之外，事實上，並未對於學校中所充斥的性別角色的規範，加以分析與思考。台灣的中等學校對於女性的性別角色的主流規範為何？這樣的規範是否種下中輟的危險因素？目前還無法回答。因此，研究者建議，這是一個可以深入研究與探討的角度。

2. 中等學校組織結構(教師, 期望, 課程內容) 以主流(白種人)族裔為主, 無形中對非主流族裔女學生造成種族歧視, 形成中輟的危險

學校的組織結構可分正式與非正式兩種，正式的組織結構意指學校正式的編組與規定，而非正式的組織則意指學校內的情感、溝通、決策、權力等的形態（林勝義，民 93 年）。不論是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學校組織結構，事實上也可能隱藏了一些可能造成學生學業中輟的危險因子。Franklin and Soto (2002) 以及 Lagana (2004) 的研究指出了教師對某些文化所抱持的刻板印象所照成的影響。他們的研究中均指出，非白種中學生的確有較高的危險性成為中輟生，Franklin and Soto (2002) 認為原因來自於學校結構是以中產的白種人的價值觀為主，在學校老師無法了解其他文化的情況下，容易對學生行為產生誤解進而責怪學生，並對學生產生種族歧視，Lagana (2004) 則認為在美國，非白種學生所得到的學校支持，同儕支持都較少，在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之下，自然就會逐漸遠離學校。雖然 Franklin and Soto (2002) 以及 Lagana (2004) 的研究並不是以女性為主，然而婦女主義 (womanism) 的概念提醒我們，少數民族的女性在社會中，經常是處於多重壓迫/歧視的情境之中，而 Dei (1995) 的研究也呼應了這樣的情況。

Dei (1995) 以加拿大公立學校中的黑人中輟生為對象，瞭解她們中輟學業的原因。研究結果顯示，受訪學生提到當她們以她們非洲裔的背景，和以歐洲白種人為中心的學校結構（包括老師，期望，課程內容）互動時，讓她們的認同 (identity) 及自我 (self) 產生矛盾與衝突，老師對於黑人女學生一開始即抱持較低的期待，事實上這是一種對有色人種的歧視與偏見的態度，也是一種刻板印象，學校中也充滿種族歧視的例子，這些狀況均讓女性學生開始遠離學校，甚至有些受訪者還提到，老師們還告訴她們，她們的族裔文化是無法幫助她們達成人生的夢想。此外，學校其他同學平常也會談一些跟黑人女性有關的有色笑話，這樣的情況讓她們覺得黑人背景是不被接受的，因此這些學生甚至期望，能夠擁有一間是以非洲裔文化為中心的學校，如此即可解決她們的學業中輟的理由。Dei (1995) 認為在現有的學校結構無法改善之前，這不失為一個解決之道。

種族歧視是上一世紀人類世界的黑死病，也是本世紀人類仍待努力解決的問題。諷刺的是，這一世紀人類的遷徙更為頻繁，因此當愈來愈多的社會成為多元文化的社會時，多元化的學生結構就挑戰了老師與學校體系的刻板印象。人類已經覺察到種族歧視是不對的態度，種族歧視就更不應該成為學生中輟的因素，這也是準備成為多元文化的台灣社會應該先有的反省。台灣的老師準備好面對其他文化背景的學生了嗎？台灣的老師是否對自己

的種族偏見，有所覺察呢？研究者認為前述 Dei (1995) 的建議，這只是加重了種族隔離的後果，如果能夠在課程中加入不同文化的教材，教師的專業訓練中加入種族意識/敏感性的培養課程，努力去除對於某些種族文化的刻板印象，才是一個解決之道。

3. 社會文化規範不認為女性接受學校教育是必要與重要的，因此社會文化本身就是形成中輟的危險因素：

社會文化規範中，對於女性角色與學校教育的信念，也是形成中輟的危險因素。Golnar (1995) 以東非及北非的國家為主，研究這幾個國家的女生中輟的原因，結果發現除了貧窮的因素之外，社會文化規範中對於女性角色與學校教育間的關係，才是主要的中輟關鍵因素。舉例來說，非洲文化中認為：農忙的時候，女兒就理所當然應該留在家中幫忙農事以及家務工作；當母親忙碌時，女兒就應留在家中照料其它手足；非洲文化不認為學校教育對女性是重要的，因為女性的責任是照顧家庭；認為將有限的家庭資源，投資在女性學校教育上是不智的，因為將來女兒會嫁人，屬於別人家，所以這樣的投資對家庭是沒有幫助的；有些女性習慣早婚的國家，因為女兒很早就結婚，因此根本不考慮讓女兒接受學校教育。Golnar (1995) 認為，社會文化的規範根深柢固，短時間很難加以改變以使女性的中輟率降低，然而還需要努力，慢慢累積成果推動社會的改變。

文化中對於學校教育價值的預設立場，已經為接受這一文化薰陶的人，種下了是否努力在學校中獲得成功的因子。Weiler (2000) 認為，女學生所來自的文化背景，對於女性求學的態度及性別角色特質等，已先有某些預設的立場 (cultural prescriptions)，例如：移民至美國的拉丁裔及亞裔，就認為學校教育是讓他們得以在美國社會立足的重要依據，而且拉丁裔的女性對於未來，並不想在經濟上完全依賴男性，她們期望經濟上的獨立能夠換取一些自主權，所以拉丁裔及亞裔的家長對於女性的學校教育，就相當重視；反觀在美國的勞動階層黑人，他們普遍認為找到一份工作較為重要，大部份的女學生都必須分擔家事，認為將來成為一個母親是很重要的，所以對於學校教育就不是非常重視，隨時可以因為找到一份工作，而離開學校。當學生帶著這些屬於族裔文化的獨特概念進入學校，和白種文化強調文憑的重要性的學校教育接觸之後，某些族群就容易變成邊緣人，進而中輟。

Fuller, Singer and Keiley (1995) 在非洲南部研究有關於女孩中輟的問題，結果發現，過去的研究都認為女孩離開學校是因為家中經濟狀況不佳，然而他們的研究顯示的是，雖然研究對象也是來自貧窮家庭，然而影響女兒是否中輟的重要因素是母親的信念。當母親的教育程度較高、對學校教育抱持信心的家庭，即使家庭資源有限，這類的家庭較不會讓女兒中輟。Fuller, Singer and Keiley (1995) 的研究同樣告訴我們，“信念”是決定女孩能否接受學校教育的重要關鍵。

台灣社會文化是否也存在上述的現象？目前研究者僅找到二篇足供思考的文獻，敘述如下：由於家庭是被認為台灣女性最重要的依歸，所以在傳統文化信念上，就不認為女性求學，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成為母親之後就不應該再去學校唸書，女性選擇科目應該要選擇女性化的科目（家政，護理）。Tu, Sheur-er (1999) 的研究指出，由於台灣的國小

及國中是屬於義務教育，因此在這個階層的學校教育，看起來似乎台灣文化相當重視女性求學，然而當我們檢視國中以上的學校教育時，就可以看出，台灣女性是不被鼓勵追求太高的學歷的。不過台灣經歷了教育改革，學校大幅增加，這樣的信念是否仍然存在？謝小岑（民 87 年）指出，台灣一般民眾對於兩性教育的期望，並未因為學校教育的擴張與提升而改變，台灣兩性間的教育程度差距逐漸縮小，但是一般民眾對於男性教育的期望，明顯高過於女性。雖然這兩篇結果不足以代表全部台灣的經驗，然而研究者與學業中輟女學生長期的接觸經驗中發現，如果國中女學生本身對於學校課業不感興趣、學業成績不佳時，家長的態度就趨向於讓孩子去工作，而讓孩子完成國中學業的原因則是避免中輟生輔導系統再來“找麻煩”。從這個角度而言，台灣社會文化對於女性角色的信念，是造成女學生學業中輟的遠因。如果台灣社會中重男輕女的概念、性別區隔的態度能夠消除，這樣的情況或許能夠改善，對於女性中輟生，就不會抱持如此消極的態度了。

總結而言，上述西方的研究結果顯示出，擁有不好的學校經驗的女性，在性別角色的特質與信念上，的確也和擁有良好學校經驗的女學生，有一些差別。學校所傳授的知識、期望與價值觀，是以主流社會或是中產階級為主時，就容易使得非主流族群與非中產階級的女學生，逐漸被邊緣化。學校經驗與女學生的性別角色特質、種族背景、社會階層之間差距及衝突過大，是造成學業中輟的重要原因。

有關台灣女性性別角色及就學經驗的研究：

這一部份的文獻探討，研究者將著重於以台灣文化脈絡的角度，所進行的台灣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的研究為主。這方面的研究，大概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以台灣文化中，對於女性角色社會化的風俗，教條為主；另外一類則是訪問台灣女性，根據她們的故事及生命歷程，來分析台灣女性的特質。

在台灣文化中，對於女性角色社會化的風俗，教條為主的研究報告方面，Leung and Chang (1994) 就指出，過去生男叫作弄璋，生女叫作弄瓦，璋比瓦來的珍貴，這代表的就是台灣文化中重男輕女的風俗。Wolf (1972) 就指出，台灣在 1960 年代，當家中的子女生病時，父母會將男生送去看醫生，而女生就用常用的草藥即可。在台灣經濟成長，且健保制度建立之後，這種現象不再出現。但是，重男輕女的觀念仍然在一些事情上反應出。呂秀蓮 (1990) 就指出，許多台灣女性都指出，如果第一胎生的是男孩，那麼她們感覺到的壓力就會少很多。這就是重男輕女的另外一種型式。Gates (1987) 指出，台灣民間將土地公形容成公平的，而將土地婆形容成吝嗇的，其實代表的就是台灣文化中，對於男女性別角色的認定。熊賢關 (1998) 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女人並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女人只有在成為母親之後，才會被尊重。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都是台灣相傳甚久的女性社會化教條 (林鶴玲, 李潔香, 1999; 劉毓秀, 1995)。過去台灣母親，也都是延用這樣的教條，來教導自己的女兒。Wolf (1972) 及 Gallin (1984) 都指出，台灣女孩從小即開始學習如何作家事，如何照顧家庭，為將來的媳婦及母親角色作準備。李美枝 (1985) 指出，台灣女孩從小即為將來的母親角色作準備，所以都被塑造成溫和，溫柔，無我的特質。李美枝 (1996) 後來分析了中國一些描述女性的故事，發現這些故事雖然描寫的是年輕的媳婦遭遇到丈夫有外遇，婆婆虐待的命運，然而故事的重點是歌頌年輕的媳婦以忍耐來面對自己的命運。李美枝 (1996) 認為，台灣文化要求台灣女性在面對許多的

不公平時，要以“忍耐”的美德來面對。

Liu(劉珠利)(2001)以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之後成長的年輕女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以質化研究的方式來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受訪的年輕女大學生，在描述自己的特質時，完全是描述自己在不同類型的人際關係中的特質，沒有任何一位受訪的年輕女大學生，以和人際關係無關的形容詞來描述自己。這個研究結果支持了“關係中的自我”理論，意即，人際取向的自我，是這一群受訪的年輕女大學生的性別特質。然而，Liu(劉珠利)(2001)同時也指出，這群受訪者更進一步的提到，和不同的對象，則表現出不同的特質。例如：和熟識的朋友，則勇於表現出自己非傳統女性的特質，例如搞笑的特質，和不是很熟識的朋友，則會以較傳統的女性特質來應對，例如保持優雅；和長輩維持很有禮貌的態度，然而當自己不同意長輩的意見時，則採取“變色龍”的態度，表面上不反駁，但私底下則堅持自己的意見；和自己的男朋友的關係方面，很著重相互的照顧，保有彼此的空間，然而兩人發生衝突時，在公眾場合以替男朋友保留面子為策略，但私底下則會具理力爭；對於未來，相當注重自己必須擁有經濟的能力，進而讓自己的生命擁有較多的選擇。劉珠利(2001)指出，這個結果呈現的是，台灣的年輕女性的人際取向的自我，在受到台灣的儒家思想，集體主義文化特質，及進入民主時代後的多元化社會環境影響下，而呈現出的面貌。

由於家庭是被認為台灣女性最重要的依歸，所以在傳統文化信念上，就不認為女性求學，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成為母親之後就不應該再去學校唸書，女性選擇科目應該要選擇女性化的科目(家政，護理)。Tu, Sheur-er(1999)的研究指出，由於台灣的國小及國中是屬於義務教育，因此在這個階層的學校教育，看起來似乎台灣文化相當重視女性求學，然而當我們檢視國中以上的學校教育時，就可以看出，台灣女性是不被鼓勵追求太高的學歷的。不過台灣經歷了教育改革，學校大幅增加，這樣的信念是否仍然存在？謝小岑(民87年)指出，台灣一般民眾對於兩性教育的期望，並未因為學校教育的擴張與提升而改變，台灣兩性間的教育程度差距逐漸縮小，但是一般民眾對於男性教育的期望，明顯高過於女性。

從這些文獻中發現，台灣文化要求女性一生以家庭為主，以家人的需要為先，但是成長於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且受大學教育的女性，生活的範圍比過去的婦女更為寬廣，家庭不再是生命的唯一。但是，研究結果也顯示出，這些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關係，仍然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擺盪。

(三) 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本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

這個部份，研究者將分二大部份來說明。第一個部份將說明本研究將採用的研究方法及原因。第二個部份將說明詳細的研究過程，包括：資料收集方法，受訪者來源，受訪者的年齡，抽樣方法(受訪者的選取)，受訪者人數，研究倫理問題，資料分析方法，研究結果的驗證，並說明如此設計的原因。

本研究採取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中的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 的方法來進行。採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原因陳述如下：

Creswell (1998) 指出，研究者必須根據研究問題的性質，來選取研究方法。Lincoln and Guba (1985) 就指出，假如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是想檢驗假設，那麼，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是比較適合的研究方法；假如研究者的研究目的，為探索被研究者的經驗，沒有任何預設的假設，那麼，質化研究方法是比較適合的方法。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及研究目的，旨在從被研究者的經驗及知覺中，建構出性別角色的模型，並非嘗試檢驗任何假設。因此，質化研究方法，是適合的研究方法。

Unger (1990) 對於性別角色的研究方法，提出兩種分類。她認為，如果研究者認定性別角色是由文化脈絡所建構而成的，意即，性別角色是一種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ed) 的變項，那麼，質化研究方法比較適合這一類型的性別角色研究。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建構出台灣文化脈絡下所塑造出的女性性別角色的特質，性別角色在本研究中，是界定為一項社會建構的變項。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質化研究是最合適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的方法。

質化研究又可以細分為很多取向。Strauss and Corbin (1990) 指出，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在幫助研究者建構出屬於那個文化脈絡的理論之研究方法。而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建構出本土性的性別角色理論。因此，本研究即以紮根理論為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資料收集方法 (data collection)，受訪者的選取，受訪者人數，資料分析的方法 (data analysis)，研究結果的驗證 (verification)，完全依據紮根理論的作法來進行。實際的作法分述如下：

1. 資料收集方法：本研究是採用半結構 (semi-structure)，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s) 的方式來收集資料。研究者已先行設計數個訪問的問題及探索 (probing) 的問題，請見所附之附件三。每一位受訪者回答相同的問題。然而，訪問的過程並非是一成不變的，研究者視受訪者回答的狀況，彈性調整訪問問題的順序，以使訪問的過程能夠順暢，且能幫助受訪者容易訴說自己的看法與經驗。除了訪問已先擬定的訪問問題之外，Strauss and Corbin (1990) 也指出，當研究者在訪問數個受訪者之後，發現了一些共同的主題 (themes)，研究者也將這些主題，納入訪問問題之中，有助於理論的逐步形成。因此，當某些主題產生之後，研究者也修改訪問大綱，這些主題納入後續的訪問之中。例如：一些受訪者都共同提到不要當好女孩，喜歡玩等議題，研究者也將者兩個主題納入訪問大綱中。本研究每一位受訪者均訪問一次，每一次訪問都全程錄音，每一次訪問約進行 1.5 小時至 2 小時。訪問結束後，研究者的助理立刻將錄音帶繕寫成逐字稿。有關於錄音的研究倫理問題，將於研究倫理的段落，再行說明。研究者於每一次訪問結束後，都書寫田野筆記 (field note)，記錄訪問的觀察、心得、與反省。
2. 受訪者來源：本研究在獲得國科會補助後，即和家庭扶助基金會聯繫，正式行文取得基金會之合作，前往宜蘭家扶中心附設的向陽學園 (現已改名為奇異果關懷中心)，由

學園中的老師（社工員）介紹學園中的學業中輟青少年，接受研究者的訪問。因奇異果關懷中心的學業中輟青少年有限，而並不一定每一位青少年都志願受訪，因此，學園中的老師並代為連絡宜蘭地區其他中途學校——善牧基金會，以及少女收容中心——慈懷園，研究者從這兩個地方又招募到一些志願受訪者。

3. 受訪者的年齡：本研究以 14-18 歲，受訪時為學業中輟的台灣女性為對象（不計算學業中輟的次數）。以學業中輟的女性為研究對象的原因，已在研究背景及文獻探討的部份，作了說明，不再贅述。以 14-18 歲為對象的原因是：性別角色的發展是青少年階段（13-18 歲）的重要任務，根據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展中心統計資料的交叉分析顯示，國中層級輟學的人數佔了中輟生總人數的八成五，因此國中層級（約 12-16 歲）的中輟生是最需要去瞭解的中輟人口；又前述文獻討論中，Weiler (2000) 及 O' Brien (2003) 的研究，都是以中學 14-16 歲的女性中輟生為對象，她們都認為這個年齡階層，是學校經驗和性別角色特質及信念，有強烈的互動的期間，這種互動所形成的邊緣化，是造成學業中輟的重要原因。基於上述幾項原因，並考量因學業中斷的因素，學業中輟生的年齡通常比正常學齡的國中生，年紀較大，以及樣本的來源較廣較容易找到志願受訪者的情況之下，乃選定以 14-18 歲學業中輟的台灣女性為對象。
4. 抽樣方法(受訪者的選取)：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 中的 theoretical sampling 是紮根理論的抽樣方式。本研究將採取 theoretical sampling 的方式來選取受訪者。Theoretical sampling 共分為三個階段來進行，第一個階段為：開放性抽樣 (open sampling)，實際的作法為儘可能的訪問每一位同意受訪，且符合本研究所要求的特性(19~21 歲，未受大學教育)的受訪者；第二階段為：關係性抽樣 (relational sampling)，實際作法為尋求跟第一階段特質或經驗不一樣的受訪者，以期能使理論的形成，更貼近真實狀況；第三階段為：區辨性抽樣 (discriminate sampling)，實際作法為：繼續尋找經驗及特質不一樣的受訪者，直到資料呈現飽和 (saturation) 的狀態為止。
5. 受訪者人數：本研究總共訪問 20 位受訪者。
6. 受訪者基本特性：受訪的 20 位受訪者的特性，請見下表，受訪對象幾乎都來自破碎家庭：

表一：受訪者基本特性

受訪者代號	年齡	備註
P1	13	被安置中
P2	14	
P3	17	服飾店打工
P4	16	美髮師助理
P5	15	
P6	16	餐廳服務生

P7	17	檳榔西施
P8	17	
P9	15	被安置中
P10	16	汽車旅館打工
P11	15	被安置中
P12	14	被安置中
P13	16	
P14	16	
P15	15	
P16	15	
P17	16	
P18	16	
P19	14	被安置中
P20	14	被安置中

7. 研究倫理問題：研究者每次訪問時都準備一份受訪同意書（請見附件二），將研究過程的相關倫理問題，例如：錄音問題，受訪者個人資料如何保密問題，受訪過程若挑起不愉快經驗的處理方式，繕寫逐字稿工作人員如何保密問題，錄音帶保存問題，研究成果報告引用受訪內容的問題，均詳列於受訪同意書中。每一位受訪者在受訪前均詳細閱讀受訪同意書，並在受訪同意書中簽字，才開始進行訪問。受訪者及研究者分別保留一份已簽字的同意書。每一位受訪者均獲得新台幣三百元的便利商店禮卷以及一份小禮物，作為接受訪問的酬謝。
8. 資料分析方法：紮根理論中有三個循序漸進的資料分析技術，分別是：開放性譯碼 (open coding)，主軸性譯碼 (axial coding)，及選擇性譯碼 (selective coding)。開放性譯碼的實際作法為：逐字逐行的閱讀訪問逐字稿，然後在每一段落中給予標籤 (label)；主軸性譯碼則是在開放性譯碼的步驟完成之後，研究者開始思考：這代表什麼意義？為什麼受訪者會提到這個？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什麼時候造成的？它的影響是什麼？經由這些問題，可以讓已經產生的主題 (themes)，更為有意義。最後一個階段—選擇性譯碼，則是選則出最能代表所有受訪者的主題，根據受訪者的敘述，將這個主題架構成理論。本研究在資料分析時，即以上述的方法進行分析。
9. 研究結果的驗證：在紮根理論中，同儕討論 (peer debriefing) 及和相關的文獻討論作比較，是二種驗證所形成的研究結果的方法。研究者在資料收集，資料分析階段中，即開始不斷的和自己的研究同儕、向陽學園的老師討論，讓同儕挑戰自己所分析出的資料，是否貼近真實。同時，研究者也將自己所分析出的資料，不斷的和文獻作比較，思考其中的相同與不同，及造成不同的可能因素為何，驗證自己的分析結果。

研究進度：

本研究在得到國科會補助款開始（假定國科會於民國 93 年 8 月開始補助）的一年的時間進行抽樣（選取受訪者），資料收集（訪問），及資料分析，及撰寫研究報告的工作。各工作進行的時間安排如下表：

表二：研究進度表

工作項目	工作進度
繼續相關文獻的收集及整理	民 93 年 2 月~民 93 年 7 月
與家扶基金會聯繫，正式行文取得合作，並拜訪宜蘭家扶中心附設奇異果關懷中心，說明研究計畫內容。	民 93 年 8 月~民 93 年 9 月
散發研究計劃說明/尋找受訪者	民 93 年 10 月~民 94 年 4 月
資料收集(訪問)	民 93 年 10 月~民 94 年 4 月
繕寫訪問逐字稿	民 93 年 10 月~民 94 年 4 月
資料分析	民 93 年 12 月~民 94 年 6 月
研究結果驗證	民 94 年 3 月~民 94 年 10 月
撰寫研究報告	民 94 年 9 月~民 94 年 10 月
寄送研究摘要給協助機構	民 94 年 12 月

(四) 研究結果：

本報告是一個初步的研究結果報告，因此下面篇幅將列出數個主要從資料中產生的主題 (themes)。

性別角色認同：好女孩 V.S. 壞女孩

本研究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是受訪者對自己的描述，是認為自己“壞”，雖然她們認為自己壞，然而進一步分析她們對於“壞”的感受時，發現她們不認為“壞”是不好的，壞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是讓她們在她們的環境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本研究的受訪者在成長的過程中，也從未認同過“文靜”“乖巧”的特質，因為這兩種特質，再他們的環境中，是無法生存。

一位受訪者以“不良少女”來形容自己，然而她覺得自己當不良少女是有其成長背景上的需要，而且不良少女的經歷，並不是壞事，是有其正面的意義的：

我覺得以前...是個超不好的不良少女..現在呢正在慢慢的改...從小到大都是那種模式，所以我覺得...我比別人更會想...可是我比別人更會獨立...我可以自己生存...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啊！

而她現在慢慢改正的是暴躁的脾氣，與同事間如果不愉快時，盡量不會再用從前暴力的方式來解決。

另外一位受訪者也有相同的經歷，她也認為當一位壞女孩不是不好：

我覺得至少…至少我比同年齡的孩子還會想，比較早出社會這樣子。

一位受訪者非常在乎別人的注意與關心，她表示自己有兩面，在長輩的面前，她會表現乖巧，以便贏得長輩的認同，而在工作上(檳榔西施以及陪酒)則會表現出不一樣的特質：

兩個面就對了… 我不想讓他們(長輩)覺得我很壞阿。因為在他們家，我算是蠻乖巧的… 另外那一面，是因為職業的關係啦，職業跟朋友的關係。對阿～向這種我們做檳榔攤的，就是要三八一點，活潑一點。對阿～阿然後像朋友，外面的朋友..朋友這樣子

一位身材較胖的受訪者，從小父母離婚後都各自再婚，所以她從小及跟祖母同住，由祖母帶大，她經常因為背景與身材被同學嘲笑，所以她就開始保護自己：

是不是我罵髒話或是我打人，他就會怕我了，他以後就不會惹我了。

她認為乖女孩的標準是：

不會罵髒話，什麼都不會，然後就只會念書幹麻幹麻…。很淑女，

她一定不會扮演這樣的角色，朋友都稱她為女暴君，在她的心目中，自有一套乖女孩的標準，在她的標準之下，她是一位乖女孩：

怎麼乖喔？這個嘛！……………我不會出去亂來，幹麻的！…最糟糕的女生就是北港香爐，

所謂北港香爐就是隨便與人發生性關係，甚至可以跟很多人發生性關係的女性的意思，這位受訪者認為這樣才叫壞女孩，而她並沒有這樣的行為，所以在她的標準之中，是一位好女孩。

一位受訪者從小就生活在家庭暴力的惡夢中，一次在父親的失控暴力中，被社會局安置於育幼院中。在育幼院中，她學會了許多自我保護的方法：

人家都叫我..太..叫太妹吧。就是那種..不一定啦，就是跟他們都是在外面混的… 我覺得..保護自己的話，到最後還是會被人家欺負，我覺得我還是…用這種方法，可以保護我自己，一方面是保護我自己，一方面讓對方知道我不是那麼好惹的人，就是這樣。

這一位受訪者花很多的時間跟研究者描述，她是如何的好勇鬥狠，後來訪問結束，研究者求證於輔導她的輔導員，輔導員表示這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部份是誇大了一些。研究者認為，這位受訪者之所以如此誇大她的好勇鬥狠，因為對她而言，研究者是一位陌生人，面對陌生人她必須虛張聲勢，就如同她所說的：一方面讓對方知道我不是那麼好惹的人，

就是這樣。

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是學業中輟的學生，甚至都是中輟好幾次的學生，而家庭背景也都是來自於破碎家庭，使得她們很早就接觸家庭以外的環境，接觸許多背景不單純的人，在這樣的環境中，讓她們必須很快的建立起保護自己的方法，認同壞女孩的角色，就是最好的自我保護的方法。由於社會上的價值，仍然認為文靜斯文的女孩，是最佳的女性認同典範，或許是和社會價值觀衝突，因此，本研究的受訪者一致認為，壞女孩的角色讓自己比較會想，這樣的解釋是真實還是自我安慰？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相信的是，不論是真實還是自我安慰，這些都是她們活下去的方法。

關係的失落

本研究的受訪者在成長過程中，都經歷了關係的失落，有一些受訪者提到家人關係失落，有一些受訪者則是提到，在成長過程中缺乏讓她們感覺到溫暖的關係。所有的受訪者都告訴研究者，她們渴望溫暖、關懷的關係。

一位來自單親家庭的受訪者，因為自小就沒有一個讓她覺得溫暖的關係，所以一直渴望一個可以帶領她、陪伴她的關係，因此她跟著男朋友做了很多打架、飆車的事，還當了小媽媽，然而她一直都不是很喜欢這些事情，她想要的只是一個關係，為了維持關係，因此她就只好跟著去做：

譬如說跟那一個在一起.. 他們玩怎麼樣我就玩怎麼樣，我們會跟著男朋友這樣子...去玩 我都是被牽著走的那種。

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單親... 就大部分都是單親，單親出來玩的人很多... 因為單親... (停頓 4 秒) ...感覺就是很不好啊！...五臟不全

一位受訪者提到自己家庭中，父親不負責任，導致家庭破碎，而自己在家中小時候是非常不受注意與不被關心的人，因此她的很多行為都在找尋關係：

我希望別人眼光停留在我身上吧！... 我就是希望多給我，就是多關心我一點，小時候開始，不管，阿就是類似做錯什麼事情阿，阿我弟或我姐都推到我身上，每次被打的都是我，阿做家事阿大部分也都是我來做

阿我們常常會聊天聊到凌晨，阿聊到會哭出來這樣子... 就是家庭阿，對阿，就是家庭阿~我阿嬤啦，我爸爸不會，就講到我阿公阿嬤這樣子。

我以前就...像滿口髒話阿，阿講話很粗魯阿這樣子。那個不是口頭禪。就是像...像是融入一群吧

同一位受訪者提到目前住在男友家，男朋友很大男人，而且在賭場工作，這不是受訪者想要的類型，然而難得有家人的接納，讓她覺得很窩心，所以繼續這樣的關係；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很委屈… 因為我跟他家人不錯阿，黑阿，就是被他們認同阿… 所以這樣的關係，讓妳(我)留下來

一位受訪者的父母離婚後都各自再婚，所以她自己三歲開始就和祖母一起住，從那時候開始，她就隔離自己的感情，不再對人有任何的感情：

我爸都說我……。我為什麼……。我為什麼不會哭，國小…三年級以後了，搞什麼阿！你(我)..你(我)哭..你不會帶我走阿！我幹麻哭，對不對？我每天哭都哭倒楣了

雖然她強調自己不再哭了，可是後來媽媽常常傳簡訊鼓勵她，讓她很感動，所以她很聽從媽媽的話，足見溫暖的關係對她的影響：

我只要…看到媽媽…我什麼都做

一位因為家庭暴力而被安置於育幼院的受訪者，提到她痛恨家庭的原因：

我原本是好好的一個人，就被送到那個育幼院，(不到)育幼院我就不會變壞，然後來這邊，所以我很恨家庭…(在育幼院中)就跟我哥哥他們阿爬牆出去阿，然後做一些…很壞的事

在育幼院中，她渴望關心，而關心她的哥哥帶著她從事一些偷竊的行為，為了那一份關心她跟著做壞事，理智上她知道這是不對的，然而當渴望關懷的需要非常強烈時，理智也就失去作用了。

本研究的受訪者，都相當期待自己的生命，能夠擁有溫暖、關懷的人際關係，這樣的結果支持了關係中的自我理論的論點，女性的自我是一種重視關係的自我。一些受訪者甚至為了維持關係，而願意做出出賣靈魂、滿口髒話、委屈自己的事情。足見一個關係對這性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貧窮女孩和學校的互動

台灣的國中體系，所呈現的價值體系，是希望同學能夠努力於功課，將心思完全用於功課上，每天努力將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目學好，行為及外表方面，則要求學生不能染髮、擦指甲油等。當本研究的受訪者，抱持著她們所認同的特質，帶著生活的背景，進入台灣的國中體系時，產生了很多的落差與摩擦。

一位受訪者提到，她能夠了解老師的辛苦，但是她覺得老師並沒有從學生的角度來了解她們：

因為我覺得當老師…。當老師的人也很難當啊…。就是老師不是說很好做..可是她可以換個角度想…。學生也不好做啊！

由於家庭破碎，家中經濟很差，所以從小就必須自己賺錢，這樣的生活形態是不可能做到學校老師對學生的各種要求：

以前我自己的學費都我自己付，那還算什麼…。對啊！從我國中…。到國三我的…。學費都是我自己付的，然後我所有的開銷都是我自己的…。能夠在學校好好應付老師講的那些事情，那更不可能…。何況我現在還負債累累

另外一位受訪者提到，學校對於她的行徑很快的就盯上，所以她在學校處在一個很特別的地位，雖然她很喜歡受人注意，可是在學校所得到的注意，讓她覺得很矛盾：

那時候是全校(都注意到我)…快樂，不是這樣講，不是快樂吧…。唉幽，很矛盾

同一位受訪者也提到，她的處境讓她無法只擔心功課，因為沒有錢的壓力，讓她是無法只專注於功課上，也無暇顧及功課：

會跟我姐講阿，就聊到說阿，跟我們同年齡的孩子阿，現在還是無憂無慮阿，現在還在上課喔，只要擔心說我的功課說怎樣怎樣就好了…。可是說像我…。又沒錢，又什麼什麼的(變小聲)

台灣的國中教育，升學仍然是最主要的價值，對於必須賺錢養自己的那一群學生，並沒有一個良好的教育方法，因為格格不入，摩擦就因而產生。當明天的生存都會出問題時，又如何能夠兼顧功課？對於這樣的一群學生，學校是否也應該用不同的標準來教育呢？

學校的態度:排斥與拒絕

本研究的受訪者，多數和學校的教師或是行政人員，互動的經驗及關係都是不好的，也有受訪者在學校捉弄老師。受訪者和學校其他同學，相處也都不好，甚至還有一些受訪者還和他們發生激烈的衝突，打架。因為這些問題行為，所以被學校排斥拒絕。

跟老師不是很好阿..然後老師會罵我…。所以讓我不是很喜歡啊！老師還會挖苦我

學校主任阿叫我轉學啊，就不要收我嘛

一位受訪者雖然學校沒有採取拒絕的態度來對待她，可是因為她缺課太多，因此她所念的國中採取一對一的方式來輔導她，對於這樣的方式，這位受訪者雖然不像其他受訪者一樣，痛恨學校，但是對於這樣緊迫釘人的方式，也覺得無奈：

也不過是老師真的是很機車(笑)…我也沒辦法…每次都一直觀察…因為好像…一節課沒去吧…就要又重來…

在台灣，當學生的出現問題行為時，老師還是習慣以權威的方式，對待學生，甚至拒絕學生到學校，眼不見為淨，畢竟排斥與拒絕對學校老師來說，是比較簡單的方式。然而當我們回顧前面“關係失落”的主題時，可以知道這一群受訪者渴望溫暖關懷的關係，所以以排斥拒絕的態度對待她們，無異就是再次的傷害她們。或許面對這樣的學生，老師們應先放下要求行為回歸“正常”的期望，先建立溫暖關懷的關係，才是幫助的開始。

(五) 對於學術研究，社會工作實務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

本研究希望能將研究結果，提供社會工作實務界，在實際服務學業中輟女性案主，及設計服務方案時的參考。在研究背景中已經陳述過，中輟生是社會工作實務界很重要的服務對象，社會工作的服務方案，從服務關係的建立、一直到方案的設計及執行，都應針對案主的特質，作修正，以期能符合案主的需要。而性別角色特質，就是一個最主要的考慮因素。當台灣社會逐漸走向多元化，當台灣努力與世界同步，當台灣社會努力走向族群和諧、兩性平等之際，各領域的社會工作實務，都應該將多元文化、性別、與社會階層的角度納入工作之中。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受訪的學業中輟年輕女性，所認同的特質和現階段台灣的國中體系，是不相容的，而這種不相容的情況雖然只是受訪女性學業中輟的部份原因，然而在過去，這樣的不相容因素並未被學業中輟的研究領域重視過。綜合上述各段的討論，研究者提出以下的建議，供台灣學校社會工作實務界參考：

1. 現階段在職的學校社工員，應藉由在職訓練等機會，培養自身的文化能力，此種文化能力包括對不同文化、性別、社會階層差異的了解，及壓迫與不平等形成的了解，並且培養性別敏感度、社會階層敏感度、與文化敏感度。當學校社工員培養出這樣的能力之後，搭配其他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更能精確的辨識出女性學生中輟的所有危險因素，並提供相關的服務與協助。
2. 女學生部份：針對具有中輟危險的弱勢女學生，除了將運用文化知識與能力來了解她們所面臨的困難之外，學校社工員可以採取增強權能的作法，以個案或是團體工作的作法，幫助這類型的學生培養性別意識，培養自我肯定的能力，培養與學校體系或是父權體系的溝通能力。和這類型女性建立起溫暖關懷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因為關係本身對她們而言，就具備很多激勵的效果。
3. 老師部份：和學校老師分享社工員的文化知識與性別知識，幫助學校老師了解來自不同背景女學生的狀況及其家庭，協助教師與女學生溝通，經由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與師生互動，減低中輟的機會。
4. 課程部份：和學校體系溝通，建議納入考量文化與性別知識的教材，一方面教導差異，滿足不同背景女學生的學習需要，另一方面還需教導這些因素如何造成壓迫與不平等，促進所有學生文化與性別意識的建立。
5. 家庭部份：由於家長和學校的良好關係，有助於及早發現問題，減低中輟情形的產生。因此社工員需要運用社工員自身的文化能力和弱勢的女學生家庭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進而促使這一類型的家長能夠參與學校教育，減低中輟情況發生。

6. 學校部份：藉由學校各種會議、活動等場合，推動多元文化，尊重差異，性別平等的概念，逐漸促使學校老師，行政人員等建立文化與性別的概念，並讓他們了解這些都是造成中輟的危險因素。若有任何種族歧視，階級歧視，或是性別歧視的狀況發生時，社工員也應該幫助學生了解那些資源能夠替她們發聲。

當社工員能夠逐漸的將多元文化、性別、社會階層的議題，從微視面，中視面，與鉅視面一一的界入處理，社會改變也就指日可待。

(六). 研究成果自評：

研究計劃結果自評：

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為了解探討學業中輟的年輕女性性別角色特質，以及她們所認同的特質跟台灣現階段的國中教育體系的互動經驗。根據研究結果，是能夠回答本研究的主要問題，因此本研究計劃的目標已經達成。就研究計劃執行的部份，本研究的資料收集及資料分析均按照預定研究步驟完成，研究經費也完全控制於預算之內。因此，就研究計劃目標與計畫執行部份的評估，研究者認為是良好的。

本研究未來於學術期刊發表的可能性評估方面，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初探性報告已在今年(民國 94 年 9 月)投稿至加拿大社會工作協會(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的年度會議(Annual Conference)，目前正在審查當中。如果能夠被接受，研究者計畫將出席報告，從中收集專家學者的意見，再將意見納入修改，然後投稿學術期刊，研究者認為被接受的可能性頗高。

參考書目

中文參考書目：

江文瑜，邱貴芬（1997）查某儂嘛要抓狂—當代台灣流行女歌的後殖民女性主義詮釋與批判。 中外文學，26(2)，23-48.

呂秀蓮（1990）新女性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

李美枝（1985）社會變遷中中國女性角色及性格的改變。 婦女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

李美枝（1996）性別與性別角色論。 本土心理學研究，6，260-299.

李淑桂（2000）中年婦女與護理人員之更年期態度及健康行為之相關探討。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山醫學院醫學研究所。台中，台灣。

李藹慈（1992）傳統與非傳統職業婦女職業選擇之相關變項比較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台北，台灣

周芬伶（1998）憤怒的白鴿。台北：元尊文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彥君（2002）一位國小女性教師性別角色態度的構成。未出版碩士論文。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彰化，台灣。

林鶴玲，李潔香（1999）台灣閩，客，外省族群家庭中性別資源配置。 人文及社會集刊，11(4)，475-528.

陳芬苓（1991）大台北地區更年期婦女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台北，台灣。

黃菁瑩（1998）台灣地區父母對子女教育期望之差異—性別角色觀和學校功能觀的中介影響。未出版碩士論文。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台東，台灣。

許雅惠（2002）性別，依賴，就業力—台灣婦女的經濟弱勢與保障。 臺大社會工作學刊，第六期，124-173.

程瓊瑩（1989）大專(商科)女學生性別角色態度與職業期望關係之探討。未出版碩士論文。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台北，台灣。

楊雅惠（1993）日據末期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婦女（1937-1945）—以殖民政府的教化

與動員為分析中心。未出版碩士論文。清華大學，新竹，台灣。

鄒金鳳（2001）親密戰爭？由母女關係看性別角色與認知的建構。未出版碩士論文。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所。花蓮，台灣。

廖福村（2000）解嚴後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變遷。台灣文獻，51(2)，197-207。

熊賢關（1998）儒家傳統中的婦女觀。哲學雜誌，24，100-117。

劉珠利（民 89 年）依賴——一個該被貶低的特質？社會工作學刊，第 7 期，頁 77-100

劉毓秀 主編（1995）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盧蕙馨（2002）慈濟志工行善的人情脈絡。慈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刊。第 1 期，頁 31-67。

羅敏綺（1998）農村婦女對兒女的性別角色教養態度方式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研究所，台北，台灣。

全國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資源研究發展中心（民 92 年）八十六學年度至九十學年度中輟學生統計分析表 on-line available: www.ntpu.edu.tw/dropout/main.htm。

教育部令（民 91 年）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edu.tw/secretary/92publicnews/9201/b05.htm>。

李書文（民 89 年）國民中學中輟生復學後的適應問題。訓育研究，38(2)，頁 57-62。

黃德祥，向天屏（民 88 年）中輟學生形成原因與對策之研究。訓育研究，38(2)，頁 16-33。

黃韻如（民 88 年）尋回迷途的羔羊——從社會工作觀點談中輟生問題。訓育研究，38(2)，頁 2-15。

陳儀如（民 87 年）政府與學校如何有效辦理中輟生的輔導。教育資料文摘，41(6)，頁 183-187。

章勝傑（民 91）台東一布農部落國中輟學生歸因歷程研究。台東師院學報，第 13 期，頁 92-135。

葉亞寧（民 87）把孩子找回來——國中中輟生問題之研究。中等教育，49(4)，頁 74-78。

溫怡雯，章勝傑（民 89 年）一個台東縣原住民國中中輟生歸因歷程之個案研究。 台東師院學報，第 11 期，頁 1-28。

程秋梅，陳毓文（民 90 年）中輟少年的復學適應：傳統復學模式與另類復學途徑之比較。 台大社工學刊，第四期，頁 45-96

劉秀汶（民 88 年）國民中學中輟生問題及支援系統之研究。 訓育研究，38(2)，頁 63-80。

劉鋸棟（民 89 年）高雄市立中山國中試辦中輟生資源班實施成效之探討。 公教資訊季刊，4(4)，頁 52-59。

鄭崇趁（民 88 年）中途學校與中輟生輔導。 訓育研究，38(2)，頁 48-56。

謝小岑（民 87 年）性別與教育期望。 婦女與兩性學刊，第 9 期，頁 205-231。

英文參考書目：

Arnot, M. (1984)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Life and School Life. Journal of Education, 166(1), p. 5-24.

Baines, C., Evans, P., & Neysmith, S. (Eds.) (1991) Women' s Caring.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Welfare.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d Inc.

Beeber, L. S. (1999) Testing an Explanatory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ng Women During a Life Transi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47(5), 227+

Berzoff, J. (1989) The Therapeutic Values of Women' s Adult Friendships.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Social Work, 59(3).

Biddle, B. J. (1979) Role Theory Expectation, Identities, and Behavio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Brown, L. M., & Gilligan, C. (1992) Meeting at the Crossroads. Women' s Psychology and Girls'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reswell, J. W. (1998)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Among Five Tradi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Davenport, D. S., & Yurich, J. M. (1991) Multicultural gender issu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 103-124.

Day, K. (2000) The Ethic of Care and Women' s Experience of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 103-124.

Donenberg, G. R., & Hoffman, L. W. (1988)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ral development. Sex Roles, 18(11/12), 701-717.

Edyed, C. J., McIntosh, D. E., & Bull, K. S. (1998) School Psychologist' Perceptions of Priorities for Dealing with the Dropout Problem.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35(2), p.153-162.

Eric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Ford, M. R., & Lowery, C. R. (1986)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ral reasoning: a comparison of the use of justice and care orient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0(4), 777-783.

Freud, S. (1927) Som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anatom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ex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8, 133-142.

Gallin, R. S. (1984) Women, famil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2(1), 76-92.

Gates, H. (1987) Chinese Working-Class Lives Getting By in Taiwa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lligan, C. (1977) In a different voice: women' s conceptions of self and of morali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47(4), 481-517.

Gilligan, C. (1982/1993)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 s Development.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den, M. (1989) Fighting back like a man: the morality of "Murphy Brown"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U. S. A.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313 754).

Goodman, D. J. (1990) African-American women' s voices: expanding theories of women' s development. Sage, 7(2), 3-14.

Jordan, J. V. (1991) Empathy and self boundary. In J. V. Jordan, A. G. Kaplan, J. B. Miller, I. P. Miller, & J. L. Surrey (Eds.) Women'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 from the Stone Center. P.67-80. New York: The Guildford Press.

Katz, P. A.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identity. Sex Roles, 5(2), 155-178.

King, C. (2002) Barriers Affecting GED Participation Among Recent High School Dropouts. Adult Basic Education, 12(3), p.145-156.

Kohler, M. P. (2000) Implementation of the "PDQ—Building Skills for Using Print" Workplace Literacy Program for High-Risk Women: A New Approach. Adult Basic Education, 10(1), p. 39-49

Kohlberg, L. (1976) Moral Stages and moralization: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 T. Lickona (Eds.) Moral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Lazzari, M. M., Ford, H. R., & Haughey, K. J. (1996) Making a difference: women of action in the community. Social Work, 41(2), 197-205.

Lawler, A. C. (1990) The healthy self: variations on a theme.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68, 652-654.

Leung, Yiu-Nam, & Chang, Wei-An (1994) The folk customs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Taiwan.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XXII, 35-47.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Liu, Chu-Li (2001) A relational self model of gender role identity of young Taiwanese women within their cultural context.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Waterloo, Canada.

Lloyd, G., & O' Regan, A. (2000) "You Have to Learn to Love Yourself 'Cos No One Else Will.'" Young Women with 'Social, Emotional or Behavioural Difficulties' and the Idea of the Underclass. Gender and Education, 12(1), p. 39-52.

Lu, Hsiu-Lien (1991) Women's Liberation under Martial Law? In E. K. Y. Chen, J. F. Williams, & J. Wong (Eds.) Taiwan, Economy, Society, and History. P. 339-354.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ies of Hong Kong.

Lu, Yu-Hsia (1983) Women's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 power structure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56, 111-143.

Lunenburg, F. C. (1999) Helping Dreams Survive: Dropout Interventions. Contemporary Education, 71(1), p.9-14.

Luttrell, W. (1997) School-smart and Mother-wise. Working-class women's identity and schooling. New York: Routledge

Lyon, N. P. (1983) Two perspectives: on self, relationships, and morali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3(2), 125-145.

Manhal-Baugus, M. (1998) The Self-in-Relation Theory and Women for Sobriety: Female-Specific Theory and Mutual Help Group for Chemically Dependent Women. Journal of Addiction & Offender Counseling, 18(April), 78-85

McIntosh, P. (1999) A Chinese Conference on Women's Studies. The Wellesley Centers for Women Research Report, 2(2), 14-15.

McNeill, S., & Petersen, A. C. (1985) Gender role and identity in early adolescence: reconsideration of theory. Academic Psychology Bulletin, 7(Winter), 299-315.

Mennuti, R. B., & Creamer, D. G. (1991) Role of orientation, gender, and dilemma content in moral reasoning.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32(May), 241-248.

O' Brien, M. (2003) Girls and Transition to Second-level Schooling in Ireland: "moving on" and "moving out." Gender and Education, 15(3), p. 249-267.

Rothbart, M. K., Hanley, D., & Albert, M. (1986)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ral reasoning. Sex Roles, 15(11/12), 645-653.

Rubinstein, M. A. (1999) Returning to Roots and Redefining Traditions: Patterns of Religious Development on Taiwan Since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Paper presented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aiwan in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Taiwan.

Sesan, R. (1997) How I Practice. Eating Disorders, 5(3), 232-237.

Shonfeld-Ringel, S. (2001)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working alliance in cross-cultural practice with non-western clients: integrating rel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multicultural theories. Clinical Social Work, 29(1), 53-63.

Sperberg, E. D., & Stabb, S. D. (1998) Depression in women as related to anger and mutuality in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Women Quarterly, 22, 223-238.

Strauss, A., & Corbin, J. (1990) Basic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 Inc.

Surrey, J. L. (1991) The 'self-in-relation' : a theory of women' s development. In J. V. Jordan, A. G. Kaplan, J. B. Miller, I. P. Miller, & J. L. Surrey (Eds.) Women' s Growth in Connection Writing from the Stone Center. P.51-66. New York: The Guildford Press.

Tu, Sheur-er (1999) The Impact of Patriarchy on Wome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學報, 第 29 期, 頁 517-541.

Unger, R. K. (1990) Imperfect Reflection of Reality. Psychology Constructs Gender. In R. Hare-Mustin, & J. Marecek (Eds.) Making a Different Psych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P.103-149. U. S. A. : Yale University.

Wang, Yi-Chun (1998)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odernized Homosexuality" Paper presented in the Fourth Annual North America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 S. A.

Weiler, J. d. (2000) Codes and contradictions. Race, Gender Identity, and Schooli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Wolf, M.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ang, Wenyi (1999) Heteroglossia of contemporary Taiwan art in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Tendency Quarterly, 12, 169-180.

Yeh, Shao-Kuo, & Creamer, D. G. (1995) Orientation to Moral Reasoning Among Men and Women Leader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36(2), 112-122.

Zelvin, E. (1999) Applying Relational Theory to the Treatment of Women' s Addictions. AFFILIA, 14(1), p9-23.

附件一：研究計畫說明書

附件二：受訪同意書

附件三：訪問大綱

附件一：

研究計畫說明書

妳好！我是東海大學社工系的老師，我現在正在從事一項有關於台灣年輕（14-18歲），學業中輟的女性，性別角色特質的研究。如果妳符合上述的條件，我很希望妳能夠參與我的研究。以下是關於我的研究的一些說明。

本研究的主題是：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成長，學業中輟的女性之性別角色特質，目的是希望能夠建立出台灣女性的性別角色理論。本研究將採用深度訪問的方式，來收集資料。妳的經驗及看法，將是我訪問的重點。訪問大約進行兩個小時。

在我訪問妳的過程中，我將會全程錄音。錄音的目的在於方便我將訪問內容，繕寫成便於分析的逐字稿。不過，只有我或是我的助理才會重聽錄音帶的內容。我及我的助理將會遵守研究倫理的規定，不會將錄音帶讓第三者聽取。在訪問內容繕寫成逐字稿之後，我也將妥善保存錄音帶，不會有任何人有任何機會，聽取妳的訪問內容。妳也將收到一份妳個人的訪問逐字稿。當妳讀完逐字稿之後，我將再次訪問妳，聽取妳對於讀完逐字稿的感想，及需再澄清的部份。訪問結束，我將送上酬勞，答謝妳的協助。

將來我的研究報告，或是未來可能發表的期刊文章中，如果必需提到妳所說的某些內容時，我將使用假名來代替妳的真實姓名。如果妳所說的內容，提到某些人名時，我也將用假名來代替，以確保妳個人的資料不會外洩。

我的訪問內容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然而，如果妳仍覺得被挑起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覺，妳可以讓我 know。必要的話，我將轉介妳前往心理諮詢機構。如果在訪問過程中，妳覺得不想再繼續接受我的訪問，妳可以立刻讓我 know，我將立刻停止訪問，錄音帶也將立刻銷毀或由妳帶走。

當我完成這個研究之後，我也將會寄送一份本研究的研究摘要給妳。如果妳願意接受我的訪問，或妳想知道更多的訊息，再作決定。請妳以電話或電子郵件和我連絡（請見下面所附電話及郵件地址）跟我連絡。如果妳同意接受訪問，我將和妳一起決定一個舒服，安全的地方進行訪問。請妳也將這個訊息，轉告給有興趣的朋友。謝謝。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劉珠利

TEL: (04)23590121 轉 2960

E-Mail: chuli@mail.thu.edu.tw

附件二：

受訪同意書(受訪者)

-----:

妳好！謝謝妳同意我的訪問。在妳正式接受我的訪問之前，有一些關於本研究的詳細內容，以及妳的權利，必需先向妳說明。

本研究的主題是：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成長，學業中輟的女性之性別角色特質，目的是希望能夠建立出台灣女性的性別角色理論。本研究將採用深度訪問的方式，來收集資料。妳的經驗及看法，將是我訪問的重點。訪問大約進行兩個小時。

在我訪問妳的過程中，我將會全程錄音。錄音的目的在於方便我將訪問內容，繕寫成便於分析的逐字稿。不過，只有我或是我的助理才會重聽錄音帶的內容。我及我的助理將會遵守研究倫理的規定，不會將錄音帶讓第三者聽取。在訪問內容繕寫成逐字稿之後，我也將妥善保存錄音帶，不會有任何人有任何機會，聽取妳的訪問內容。妳也將收到一份妳個人的訪問逐字稿。當妳讀完逐字稿之後，我將再次訪問妳，聽取妳對於讀完逐字稿的感想，及需再澄清的部份。訪問結束，我將送上酬勞，答謝妳的協助。

將來我的研究報告，或是未來可能發表的期刊文章中，如果必需提到妳所說的某些內容時，我將使用假名來代替妳的真實姓名。如果妳所說的內容，提到某些人名時，我也將用假名來代替，以確保妳個人的資料不會外洩。

我的訪問內容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然而，如果妳仍覺得被挑起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覺，妳可以讓我我知道。必要的話，我將轉介妳前往心理諮詢機構。如果在訪問過程中，妳覺得不想再繼續接受我的訪問，妳可以立刻讓我我知道，我將立刻停止訪問，錄音帶也將立刻銷毀或由妳帶走。

當我完成這個研究之後，我也將會寄送一份本研究的研究摘要給妳。最後，再一次謝謝妳的參與。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劉珠利

TEL: (04)23590121 轉 2960 E-Mail: chuli@mail.thu.edu.tw

我已讀過上述的說明，也瞭解相關的細節及我的權利，我願意接受訪問。受訪者及研究者各持一份本同意書。

受訪者簽名：

日期：

研究者簽名：

日期：

附件三：

訪問大綱

謝謝妳願意接受我的訪問。在我開始進行訪問之前，我先向妳說明整個訪問過程。我將問妳數個問題，請妳就我的問題，談談妳的故事及經驗。有一些訪問過程中的特別議題，已詳列在受訪同意書中。請妳先讀過這份同意書。如果沒有任何問題，請妳在同意書中簽名。然後，我將開始進行訪問。

1. 妳覺得妳是何種特質的女孩？

1a. 請妳舉例說明。

2. 對於妳自己的特質，妳有何感想？

2a. 妳認為是什麼原因，使妳蛻變成具有上述特質的女生？

3. 妳認為妳是一位傳統的台灣女生嗎？為什麼？

3a. 妳認為妳那些特質是屬於傳統的女性特質？

3b. 妳認為妳那些特質是屬於非傳統的女性特質？

4. 妳認為妳是好女孩還是壞女孩？為什麼？

4a. 妳希望當什麼樣的女孩？

4b. 對妳來說，玩有何意義？

(此部份題目，是由訪問過程中產生，並進而納入)

5. 妳的家人及朋友，對妳的特質有何看法？為什麼？

6. 妳最滿意自己那一項特質？為什麼？

6a. 妳最不满意自己那一項特質？為什麼？

7. 請談一談妳的學校經驗。

7a. 請談一談妳最好的學校經驗。為什麼這是最好的經驗？

7b. 請談一談妳最不好的學校經驗。為什麼這是最不好的經驗？

8. 妳對於自己的人生，有何計畫？

8a. 是什麼原因讓妳對妳的人生，作這樣的計畫？

8b. 當妳作這樣的人生規劃的時候，妳是否把“女性”的角色納入考慮？如何納入？為什麼？

9. 請談一談妳和男性的關係。(包括：父親，男老師，男性長輩，男朋友，兄弟，男同學/男同事)

9a. 妳認為是什麼原因，形成這樣的關係？

訪問日期：

受訪者姓名：

受訪者地址：

受訪者來自的城市：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訪問地點：

連絡電話：

受訪者目前的職業：